

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思想的现代语言学阐释

夏艳丽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26年6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术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涉及经学、训诂学、音韵学、天文历算及哲学等多个领域。近年来，也有学者从典籍翻译、概念解释和语言理解路径等角度重新讨论戴震思想，提示其训诂方法与现代语言研究之间具有一定的对话空间。本文在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为核心线索，借助语义学、历史语言学、语用学及语言哲学等视角，对戴震语言思想作现代阐释。文章指出，戴震并不只是从事文字校勘与训诂的学者，而是将语言看作理解经典、形成知识以及把握义理的关键路径。他注重字词意义在历史中的变化和具体语境的作用，讲求语言材料的实证基础，反思脱离文本依据和语言实际的义理阐发。其“由字通词、由词通义”的方法，不仅体现了戴震重实证、求确诂的学术精神，也表现出他的准语言本位倾向与语义分析倾向。对戴震语言思想的现代阐释，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的理论资源及其思想价值。

关键词

戴震，训诂学，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现代语言学，语义学

A Modern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 of Dai Zhen's Thought of "Understanding Words through Characters and Grasping the Dao through Words"

Yanli Xi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Dai Zhen was a pivotal figure of the Qianjia School of scholarship in the Qing Dynasty, whose academic inquiries spanned multiple disciplines including Confucian classics, exegetics, phonology, astronomy, calendrical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revisited Dai Zhen's thought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classical text translation,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frameworks, revealing potential avenues for dialogue between his exegetical methodologies an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research. Drawing on existing scholarship,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modern reinterpretation of Dai Zhen's linguistic thought centered on his core maxim "comprehend phrases through individual characters, and attain moral principles through phrases," deploying analytical lenses from seman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paper argues that Dai Zhen was far more than a textual collator and exegete: he regarded language as the fundamental medium for interpreting canonical texts, constructing knowledge, and grasping moral principles. Attentive to the historical shifts in lexical mean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pecific contextual constraints, he insisted on empirical grounding for linguistic evidence and criticized moral reasoning untethered from textual foundations and real linguistic usage. His methodology of "accessing phrases via characters and accessing meaning via phrases" not only embodies Dai Zhen's academic ethos of prioritizing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ursuing definitive lexical glosses, but also manifests his proto-linguistic orientation and his inclination toward semantic analysis. A modern re-evaluation of Dai Zhen's linguistic thought facilitates a renewed appreci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intellectual value embedded with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 scholarship.

Keywords

Dai Zhen, Exegetics, Understanding Words through Characters, Grasping the Dao through Words, Modern Linguistics, Seman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戴震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既是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代表，又是清代思想史上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其学术贡献并不局限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是试图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精密考证，重新理解儒家经典中的核心概念，进而反思宋明理学在经典解释和义理建构中的若干问题。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理解经典之义，不能脱离字词训诂；谈论义理，也不能悬空于语言文字之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后世常以“由训诂以明义理”^[1]概括戴震学术的基本方法。

近二三十年间，学界关于戴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几个方向。其一，是从清代学术史和乾嘉考据学传统出发，讨论戴震与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之间的学术关联，强调其治学方法中的实证精神、考据方法和训诂基础。徐玲英、梁妍《再论惠栋、戴震的学术关系及治学异同——基于〈尚书古义〉和〈尚书义考〉的考察》以惠栋《尚书古义》和戴震《尚书义考》为中心，比较二人在经学取径、文献征引、训诂方法与义理关怀上的异同，指出惠栋重在保存和发明汉学古义，戴震则在继承汉学考据传统的同时，更强调由字义、制度、名物以通经明道，体现出乾嘉学术内部从汉学复古到义理重构的复杂关系^[2]。其

二，是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出发，关注戴震对“理”“性”“欲”“善”等儒家核心概念的重新解释，讨论其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回应、修正与重构。林存阳、周轩《戴震义理学的构建路径及其思想旨趣新探》指出，戴震义理学以“通经明道”为核心理念，通过《孟子私淑录》《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中对“道”“理”“性”“善”等儒学概念的训诂疏解与义理重构，逐步形成了以经学考证通达圣贤之道、以经典诠释回应并重塑理学问题意识的思想体系[3]。其三，是从训诂学、音韵学和典籍翻译角度出发，分析戴震对字义、古音、名物制度和文献用例的重视。周忠浩《戴震训诂思想视角下的典籍翻译三层次论》从戴震训诂思想出发，提出典籍翻译的多层次理解路径，强调训诂、语义和义理之间的递进关系，这为重新认识戴震语言思想提供了重要启发[4]。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戴震“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方法论意义，但多侧重于清代考据学、经学史、哲学史或翻译研究维度；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尤其是从语义学、历史语言学、语用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交叉视角，对其“字-词-义理”理解路径作系统阐释的研究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本文中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并非戴震原文中的固定表述，而是学界对其语言思想和治学路径的一种概括。“由字通词”是指通过对文字形体、音读、古义、用例及其历史演变的考察，理解词语在经典语境中的真实含义；“由词通道”是指经典中的义理并非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必须通过词义、句义、篇章意义的层层疏解才能得以显现。换言之，戴震的“道”不是脱离具体语境的理解，而是蕴含于语言文本之中，并通过语言解释而被揭示。

需要说明的是，戴震的研究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语义学或语言哲学，但其训诂实践中确实表现出若干可以与现代语言学对话的因素。本文中的“语义分析倾向”，主要指他通过字义、词义、用例和语境来限定解释范围；所谓“准语言本位立场”，则指他强调经典义理必须经由语言文字的考释才能获得可靠理解。本文对相关现代语言学术语的使用，主要是一种阐释性、比较性的理论借用，而非对戴震思想作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直接归类。系统功能语言学最核心的理论是，语言的应用受到其所在语境(context)的影响[5]。词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语境使用和社会文化实践中生成。若以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戴震，可以发现其治学方法与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些观念存在可对话之处：他重视词义的历史层累，体现出历史语义学意识；他强调名物制度与词义理解的关系，体现出语境分析意识；他以字词为进入经典义理的基础，体现出语言哲学意义上的准语言本位立场；他反思脱离文字材料和文献依据的义理阐发，也显示出对解释者过度投射问题的警惕。

本文拟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对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思想作初步阐释，以期说明戴震语言思想在中国语言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双重价值。

2. “由字通词”：戴震训诂方法中的语言分析意识

2.1. 从文字入手：字形、字音与字义的综合考察

中国传统小学由文字、音韵、训诂三大分支构成。戴震身处清代考据学兴盛的氛围之中，他坚持一个基本看法：要准确理解经典，首先必须辨明字词的音义，这是根基所在。与单纯谈论义理者不同，戴震十分重视字的形、音、义之间的联系[6]。他通过考察字形结构、古音关系、文献用例以及名物制度，辨析经书中关键词的本义、引申义和语境义。

从现代语言学来看，戴震的这种方法体现出较强的语言形式意识。现代语言学强调，语言包括形式与意义两个方面[7]。字形、语音、词义虽然分属不同层面，却共同参与意义建构。戴震虽然不可能使用“音位”“词素”等现代术语，但他在实际研究中已意识到：若不辨析字形、音读和古义，就难以准确理解经典文本。例如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对“理”“性”“命”“才”“道”等概念进行疏证，并非直接进行哲学阐述，而是先从字义、用例和经典语境入手，力图还原这些词在先秦儒家语境中的意义。

这种研究路径与现代语义学中的“词义分析”具有一定相通性。现代语义学认为，词义不是任意解释的结果，而有其语言系统内部的根据和使用上的约束。戴震正是通过字词考证限定解释范围，避免解释者将后出观念直接投射到经典文本之中。

2.2. 从单字到词语：意义不是孤立字义的简单相加

“由字通词”并非停留于孤立字义的训释。戴震的确看重字义，但他的用心不在于孤立地讲解某一个字，而是借助字义的考订，一步步理清词语、句子乃至整段篇章想要表达的东西。中国古代典籍里，许多核心概念往往以单音节字的面貌出现，像“理”“性”“欲”“善”这类字，在行文中承担的其实是词的功能，负载着特定的思想内涵。戴震所说的“字义”，在很多情况下更接近今天语言学里讲的“词义”或“概念意义”。

由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看，汉语的“字”和“词”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古汉语以单音节词占多数，字跟词的关系比现代汉语贴得更紧，但字并不必然等于词。戴震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的“词”的概念，可他在解释经典的实践中已经察觉到，要读懂经文，光知道表层意思不够，还得看这个字在具体搭配、句法环境以及上下文里到底怎么用。比如“理”这个字，要是只按后世理学赋予它的抽象本体那套意思去理解，就会脱离先秦经典原有的语境；反过来，如果能结合古书里“理”跟事物条理、分理、肌理这些偏重经验层面的意义关联来读，才更靠近戴震想要还原的那个意义世界。这说明戴震并非机械的逐字训释者。他通过字义进入词义，又通过词义进入经典概念的思想结构。这种方法与现代语言学中“词汇语义不能脱离组合关系和语境关系”的观点相近。

2.3. 重视古义与用例：历史语义学意识的体现

戴震“由字通词”的做法的鲜明特点，就是他特别看重古义。在他看来，后人解释经典时，最要警惕的就是拿今天的意义去套古人的意思，或者用后起的含义去替换最初用法。宋明理学家在解读儒家典籍时，倾向于依据其自身的理学问题意识重释先秦文本。戴震主张回到古代文献本身，借助训诂考订，尽可能辨析字词在相关经典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种方法具有鲜明的历史语义学意识。

现代语言学认为，词语的意义变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认知的加深、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以及词汇发展自身规律都会影响词语的意义上的变化，这不单单是指词的名称上的变化，也包括词义的变化[8]。一个词在不同时代可能具有不同意义，甚至同一词形之下可能叠加多个历史层次。若不区分古今意义，就会造成理解误差。戴震虽然没有现代历史语义学理论，但他在实践中已深知词义历时变化的重要性。

以“理”为例，宋明理学讲“理”，往往将“理”解释为具有较强形而上意义的本体性概念。戴震坚持认为，“理”就落在具体事物的条理里，落在人情自然和日用伦常当中，并非脱离人情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原则。他翻检经典中的用例，一条一条梳理出来，就是要说明一件事：不能把“理”解释成脱离了具体人情事物的抽象本体。这不仅涉及哲学立场差异，也涉及词义解释路径的不同。戴震对“理”的这番重新解释，其实就是把被后世理学体系改造过的词义，重新放回到先秦儒学和日常经验的语境里去理解。这可以说是一次相当典型的历史语义清理。

3. “由词通道”：语言解释与义理建构的关系

3.1. 义理不能脱离语言：戴震的准语言本位倾向

戴震学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他并不满足于文字考证本身，而是把字词训释作为通达经典义理的基础。所谓“由词通道”，即意味着“道”并非可以绕过语言直接把握，而必须通过经典文本中的语言形式逐步呈现。

从现代语言哲学看，戴震思想中包含一种朴素的准语言本位倾向。现代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与沟通中最重要的工具，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传递信息，相互之间交流思想[9]。经典中的“道”不是悬浮于文本之外的抽象精神，而是通过字词、句法、篇章和历史语境具体表达出来的。解释者若脱离语言形式任意发挥，所谓“义理”就可能成为解释者的过度投射。

戴震认为，宋儒在解释经典时往往将后起的义理体系带入先秦文本，把后来形成的义理系统投射到先秦文本上，可能会影响对先秦文本语义的辨析。这一批评放到现代诠释学的框架里看，其实触及了“过度解释”的问题。戴震的立场很清楚：解释者必须回到语言材料本身，拿字词的用法当证据，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由此建立起经得起推敲的意义解释。

3.2. 从词义到概念：儒家核心范畴的语义重构

“由词通道”的核心环节，是通过词义辨析重构概念意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表面上是对《孟子》中若干关键词的字义疏证，实质上则是通过对核心词汇的重新解释，重建其儒学思想体系。戴震并不是先有一套抽象哲学体系，再用文字解释加以证明；相反，他是通过对经典概念的语义辨析，逐渐推出自己的义理立场。

从现代语义学角度看，概念并不是孤立词义，而处于一个语义网络之中。一个核心概念的意义变化，往往会牵动整个思想体系的改变。戴震对“理”“性”“欲”“善”等词的解释，实际上是在调整儒学话语中的概念关系。例如宋明理学常将“理”置于“欲”之上，形成“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分模式；戴震则认为欲望、情感与人的自然生命不可分割，所谓“理”也应落实在人情日用之中。这样一来，“理”与“欲”的语义关系便从对立关系转化为内在关联关系。

这表明，戴震所做的训诂工作并非孤立的字词注解，而是一套有着内在理路的概念重构。现代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义学强调，词义背后有一整套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在支撑[10]。戴震通过重新解释儒家关键词，实际上改变了理解儒家经典的概念框架。因此，“由词通道”并非简单地从词义推出道理，而是通过词义网络的调整，使经典之“道”获得新的阐明。

3.3. 语言、经验与“道”的现实基础

戴震强调“道”必须落实于人情、物理和日用实践。这一点与其语言思想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字词意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现实经验、名物制度、社会生活相联系。解释经典中的语言，必须考察其所指涉的实际事物、制度背景和生活经验。由此可见，戴震“由词通道”的“道”不是抽象玄远之道，而是有经验根基、生活根基和历史根基的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词义与世界知识密切相关。理解一个词，不仅要知道它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还要掌握它所涉及的百科知识、文化背景和使用情境。例如解释古代典籍中的礼制、名物、官职、器物、伦理概念，都不能只依据现代词典意义，而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语境。戴震的名物训诂正体现了这种思想。

在这一意义上，戴震的语言思想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他强调通过文献、实物、制度和历史事实来解释语言，反对脱离文献语境和经验基础来理解语言概念。其“由词通道”正是通过经验化的语言解释，重新建立义理的现实基础。

4. 戴震语言思想的现代语言学阐释

4.1. 语义学视角：词义的确定性 with 开放性

现代语义学大致有这样一个共识：词义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会因语境变迁和历史演进而呈现出

开放的一面。有意思的是，戴震的训诂方法恰好兼顾了这两个维度。一方面，他强调字词有其本义、古义，必须落实到文献依据上，不能脱离文献依据展开解释。这背后是他对词义确定性的坚持——解释活动必须受到语言材料约束。另一方面，戴震也并不把词义当成僵死不变的东西。他在考辨字词时，常常留意到词义的引申、转化，以及在不同语境中呈现的微妙差异。这又说明他意识到词义具有一定的历史生成性。以现代语义学术语来说，戴震关注的不仅是词的“指称意义”，也包括其“概念意义”和“语境意义”。他对儒家核心概念的解释，既要考证词语在古代文献中指什么，也要说明这些词在思想体系中表达什么。由此可见，戴震的语义分析倾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4.2. 语用学视角：经典解释中的语境意识

语用学强调语言意义离不开使用语境。同一句话、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理解。戴震解释经典时，十分重视上下文、时代背景、说话对象和制度环境。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语境”概念，但其实践中有较强的语境意识。在他看来，孟子之言必须放在战国时期的思想环境、社会问题和儒家传统中理解，而不能以后世理学家概念体系加以覆盖。比如“性善”问题，若从宋明理学的形上性理结构去理解，便容易将“性”解释为超越情欲的纯粹天理；而戴震则倾向于从人的生命情感、知觉能力和日常伦理实践中解释“性善”。这种解释实际上体现了对语境意义的重视。从现代语用学看，戴震关注的是话语的“使用条件”和“解释条件”。经典语言不是抽象符号，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被使用的表达。理解经典，就要恢复语言发生作用的语境。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古代文献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4.3. 历史语言学视角：古今意义差异与词义演变

历史语言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语言如何在时间中发生变化。戴震对古音、古义和古代制度的重视，恰恰暗合了这一基本精神。在他看来，古书之所以难读，往往不是因为文字本身有多玄奥，而是因为后人跟古人在语言习惯、制度背景和生活经验上已经拉开了距离。如果不通过考据功夫去恢复古代的语境，想要准确理解古书是很困难的。戴震对古今意义差异的那份敏感，说明他对词义演变有着相当深切的认识——很多词在后世被不断哲学化、伦理化，其含义早已不同于先秦时期。戴震借助文献互证和训诂分析，试图把这种变化梳理清楚。这套做法，跟现代历史语义学所关注的“语义演变”“概念史”“关键词研究”其实有相通的地方。进一步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具有某种“概念辨析”或“概念史式”的研究特征。这里的“概念史式”并非指其具有现代概念史的自觉方法，而是指其关注核心概念在不同时代解释中的意义差异。他所做的工作，不单是解释个别字的意思，更在于追问这些核心概念在儒学传统中的意义是怎样被一层层改变的，而这种改变又如何影响到了后人对思想的理解。

4.4. 语言哲学视角：名实关系与意义根据

中国传统语言哲学中，“名实关系”是重要问题。戴震重视名物考证，强调名称必须对应实际事物、制度和经验。他的语言观并不是纯粹形式主义的，而是认为语言意义与现实世界有密切联系。从现代语言哲学角度看，戴震关心的是意义的根据问题。一个词为什么具有某种意义？解释经典时依据什么确定词义？戴震的回答是：依据古代文献中的实际用例，依据名物制度，依据人的共同经验，依据经文本身的语言脉络。换言之，词义不是解释者主观赋予的，而是在语言使用、历史事实和经验世界中获得根据。这种观点与现代语言哲学中的某些思想有相近之处。例如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强调“意义在使用中”，戴震虽然不可能提出类似命题，但他通过大量文献用例确定词义，实际上重视词语在具体使用中的意义。同时，戴震也不像极端相对主义者那样认为意义完全不确定，他始终相信通过严密考证可以接近经典本义。这种立场兼具实证性与解释性。

5. 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思想的学术价值

5.1. 对清代考据学的超越

戴震属于乾嘉考据学传统，但又超越了单纯考据。他的文字训诂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服务于经典理解和义理重建。若只把戴震看成训诂学家，便会低估其思想深度；若只把他看成哲学家，又会忽视其哲学建构的语言基础。“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恰恰说明，戴震学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打通了小学与义理、语言与思想、考据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他以语言为路径进入思想，以训诂为方法重建经典之道。这种学术方式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2. 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启示

中国传统语言学在很长时期里是以“小学”的形态存在的，后来被现代学科分类切分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几个板块。但如果从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就会发现传统小学并非缺乏理论意识，只不过它处理语言问题的方式跟西方语言学不同罢了。戴震的治学路径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传统语言学关心的远不只是文字的音和义，还牵涉到语言与经典、语言与制度、语言与思想之间那层错综的关系。对戴震语言思想的研究，因此也就有了一层特别的价值：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发掘中国传统语言学自身蕴含的理论资源。尤其是戴震对词义历史性、语境性和经验基础的看重，可以与现代语义学、语用学、历史语言学展开对话。

5.3. 对当代经典解释的启发

经典解释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仍然绕不开一个基本难题：怎样防止解释滑向缺乏文本依据的当下附会和过度阐发？戴震的做法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值得重视的启发。解释经典，首先得尊重语言材料本身，扎扎实实地做字词训诂，把历史语境摸清楚，不能随随便便拿后世的观念往古代文本上套。但解释又不能只停在字面训释这一步，还得透过语言分析去把握背后的思想脉络。这就意味着，真正有效的经典解释，必须在“训诂”与“义理”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丢掉训诂，义理阐发容易脱离文本依据；抛却义理，训诂又可能沦为支离破碎的锱铢之学。戴震所走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条路，恰恰是两边兼顾的一个典型。

6. 结语

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思想，体现了其学术方法的核心特征：以字词训诂为起点，以经典义理为归宿，以语言分析沟通文本与思想。本文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对这一思想作了初步阐释，认为戴震语言思想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现代意义：第一，他重视字形、字音、字义和文献用例的综合考察，体现出语言形式与意义结合的分析意识。第二，他强调古义和用例，注意古今词义差异，体现出历史语义学意识。第三，他借助字词解释来重新梳理儒家的核心概念，这就表明，词义分析完全可以参与到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去，不是辅助性工作，而是触及根基的工作。第四，他强调语言的意义离不开名物制度、人情经验和社生活，这说明他表现出较强的语境意识，也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第五，他对那种脱离语言材料、凌空架构的义理进行反思，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语言哲学意义上的准语言本位立场——离开语言谈义理，在他看来是不可行的。综合这些面向来看，戴震远不只是通常所说的清代考据学家，更是一位有着深厚语言意识的思想者。他的训诂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校勘和字义考辨，而是一套经由语言来通达经典之道的思想方法。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阐释戴震，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学术质地，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语言学资源完成一次有意义的现代转化。

参考文献

- [1] 祁龙威. 由训诂以明义理——读刘台拱《论语骈枝》[J].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2008(2): 1-4.
- [2] 徐玲英, 梁妍. 再论惠栋、戴震的学术关系及治学异同——基于《尚书古义》和《尚书义考》的考察[J]. 学术交流, 2024(6): 169-180.
- [3] 林存阳, 周轩. 戴震义理学的构建路径及其思想旨趣新探[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53(3): 123-130.
- [4] 周忠浩. 戴震训诂思想视角下的典籍翻译三层次论[J]. 中国翻译, 2025, 46(1): 14-22+189.
- [5] 张新芝.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J]. 英语广场(下旬刊), 2016(2): 13-15.
- [6] 苏子惠. 戴震《毛诗补传》“音义互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郑州大学, 2021.
- [7] 曲明江. 从文化视角阐释语言意义的形成因素[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67-69.
- [8] 郎宁. 1949-1966 年产生的新词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演变[D]: [硕士学位论文]. 保定: 河北大学, 2016.
- [9] 陈巧婵. 幼儿认知发展视角的语言课程实践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18.
- [10] 于屏方. 动词义位中内化的概念角色在词典释义中的体现[J]. 辞书研究, 2005(3): 36-44.